

一张蓝图绘到底 同心共筑平安梦

平安浙江新愿景: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上)

(上接1版)

平安不平安,老百姓说了算

“平安不平安,最终要落实到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上。”省委书记夏宝龙如是说。

在富春江畔工作了十多年的李碧峰对此深有感触。作为杭州市富阳区环保局江南环保所所长,李碧峰见证了富春江“千年山水,化茧成蝶”的蜕变。正是顺应老百姓对“青山绿水”的期盼,13年来富阳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重治千年造纸业,换得江面粼粼波光、远处群山含翠的富春风光。

治水治气、治城治乡、治土治山,我省努力构筑“大平安”格局,带来妥妥的幸福生活。

保障民生,始终是应有之义。连续6年,“十件实事”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群众提、大家定、政府办”,解决的是养老服务、食品安全、城市治堵、环境治理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项目。

群众需求,始终是第一信号。曾被称为“全国十大堵城”之一的杭州,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当出行难成为老百姓揪心的问题、热议的话题时,杭州迎难而上,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让“城市大脑”和大数据发挥“智慧”作用,让交通整治形成强大威慑,最终换来市民“上下班路上越来越通气”的切身感受。

问题导向,始终是关键所在。打击侵财专项行动,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全省交通大整治,部署视频监控“雪亮工程”……平安难题一个一个地破解攻克,社会治理项目一项一项地有序推进,一点一点地提升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民意所需,也让浙江干部群众始终奔跑在预防矛盾发生的

源头。13年来,浙江致力于把预防矛盾纠纷贯穿重大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全过程,探索实践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重大决策先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关,专业人民调解组织蓬勃发展,“多元化解中心”凝聚各方合力,网上调解平台方兴未艾,诉调、检调、警调无缝衔接……

“我在基层工作了20年,见证了我管辖社区的每一点微小变化。一开始矛盾多、治安差,我们的手段也传统。但现在,房子在变老,老百姓的安全感却在不断提升,他们愿意加入进来参与巡防、化解纠纷。这或许就是平安浙江建设的意义所在。我愿意和大家一起,一直奋斗在这里。”嘉兴南湖派出所社区民警李持忠说。

打造平安建设人人有责的命运共同体

平安是底线,守住底线,依托的是全社会力量。13年来,平安浙江建设不断激发社会自治、能动、协同力量,致力打造平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起全民共建共享的平安浙江建设新格局。

“叮当,叮当”,今年3月6日下午6点,杭州下城区凤起路上的和乐苑小区里,身穿红马甲的武林大妈占阿姨摇起了手中的铃铛。这时,各家各户都从家里提着垃圾袋出来了,在占阿姨的监督下,分类扔掉垃圾,并换得相应积分。监督垃圾定点分类,是占阿姨的工作之一,她和其他4名武林大妈一起,将和乐苑小区管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穿着红色马甲的武林大妈,在G20杭州峰会期间,掀起了一阵红色旋风。他们跨越性别、年龄和职业,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忙忙碌碌,贡献着业余时间和热心,为的就是让杭州能够更加平安。

59岁的庄金芳认为,平安,不光是政府的事,而应该是大家的事。这位“乌镇管家”一有空就在乌镇的小巷里穿梭,路灯不亮、谁家有点口角,他都要去“管管闲事”。

17年坚守调解热线的叶兰花,是衢州市柯城区“兰花热线工作室”主任。2010年3月,她用自己的手机号开通了衢州首条公益性调解服务热线,承诺24小时为社区居民服务。叶兰花没想到,这条热线影响了“一群人、一座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走出了一条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示范带动、社会公众参与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有机统一的新路子。

武林大妈、乌镇管家、兰花使者,是浙江230余万人、3.5万余支平安志愿者队伍的组成部分。平安浙江建设的主体中,既有志愿者队伍,也有企业、单位、村居组建的各种群防群治队伍;既有来自四海八方的乡贤参事会,也有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激发社会自治力量,平安浙江建设从“政府独唱”变为了“社会合唱”,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多元互动的良好局面。

本报明日将刊登《平安浙江新愿景: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下)》,敬请期待!



治堵保畅

网络众筹助病患,质疑之声未间断 爱心捐如何才能放心捐?

《人民日报》

“高中同学病情危急!恳请大家伸出援手!”“这是我亲戚的朋友,信息真实,请大家帮帮病重的他”……近年来,随着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持续火热,个人求助性质的网络募捐信息不时在朋友圈刷屏。在网友踊跃献爱心的同时,“敛财”“骗捐”等质疑也从未间断,如何看待这样的网络公益众筹?如何监管,才能确保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规范?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公益众筹为啥火?

打开微信朋友圈,不时会有各类求助信息映入眼帘。点开标题,筹款请求界面便跳转出来,显示求助者筹资项目的原因、详细要求、目标金额、已筹金额等,捐助者可点击“帮助TA”捐款,还可以将募捐信息分享到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公益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面对医疗保险无法完全覆盖的大病,不少病患家庭面临短期筹资困难或资金短缺、无钱治病的难题。如何快速获得“救命钱”,成为他们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与寻求公益组织的帮助相比,通过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发起个人众筹,使用程序相对简单,求助者只要点击发布按钮,上传身份证、医院诊断证明、缴费单等相关证明,便可以进行资金众筹。

众筹平台“轻松筹”创始人于亮表示:“网络公益众筹打破了传统公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通过社交熟人关系为大病患者提供了高效便捷、‘随手公益’的筹款渠道。”

“将众筹这个模式借鉴、移植到网络募捐,也是对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的有益补充。”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说。

正因如此,个人求助众筹发展迅猛。以“轻松筹”为例,2015年全年,该平台上发起的个人救助项目为2.3465万个,筹款金额超过1.875亿元;到2016年上半年,平台上发起的个人救助项目已升至4.5万余个,筹款总额则超过了4.5亿元。

众筹成“致富新路”?

随着“骗捐”“敛财”等新闻不断曝光,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存在的问题与漏洞逐渐显现。

2015年8月,女子杨某通过个人微博发布虚假信息,谎



称其父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遇难,母亲已于一年前去世。微博发布不久就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同情。借助微博“打赏”功能,杨某骗取网友近10万元“打赏”。

虚构病情、制造虚假证明,将众筹平台视为敛财的手段和捷径,类似这样的虚假个人网络求助不在少数。同时,目前对所募集资金的监管也处于“模糊地带”,善款募集虚高、金额过于随意、支配不透明等问题时有发生。有媒体报道,一名女大学生为病母筹款6万余元,事后却在朋友圈晒“吃喝玩乐”,母亲病情进展、钱款花费明细、医疗账单等情况却基本不更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副院长杨东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时表示:“众筹平台的准入门槛很低,一些平台项目审核把关不严,为一些人卖惨敛财提供了可能。”

“目前,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在项目审核、流程监管、善

款使用等方面都缺少清晰的行为及法律边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作人王维维表示。

事实上,网络众筹平台对此并非没有应对措施。“我们尽可能地严格审核,并在每个人救助筹款页面中增加了‘举报’功能,一旦有人举报,我们就会暂停该项目的众筹,针对举报进行核查。”于亮介绍说。

但这种审核有时也并不容易。有业内人士坦言,除非求助者配合,否则由于无规可依,又涉及个人隐私,在做大病救助的项目验证时,的确可能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

此外,于亮也表示,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不支持众筹平台对个人求助者所筹资金的后续使用情况进行干预,他们只能反复劝说发起人公示后续资金使用情况。

如何才能更规范?

“众筹平台的规范化迫在眉睫。”杨东说,互联网众筹平台亟待提高专业能力,从技术层面堵住漏洞。

一些众筹平台也做出了有益尝试。于亮表示,除了不断完善自身审核流程,“轻松筹”也在积极跟政府管理部门及医院对接,核验筹款人所提供材料证明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腾讯乐捐平台上,非公募机构或个人发起的项目,需经过公募机构审核项目的真实性、家庭情况、项目设计和可执行性等。

相关部门也从2016年开始对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规范化治理进行探索。2016年8月22日,腾讯公益、中国慈善信息平台、新浪微博微公益、“轻松筹”等13家网站,被纳入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同时,从2016年9月1日起,我国首部慈善法正式实施,对慈善组织利用网络等平台开展公开募捐等行为做了明确的规定。

不过,对个人求助的监管目前相对更加薄弱。王维维认为,虽然慈善法无法约束个人求助行为,却可以通过对网络公益众筹平台的监管来间接地规范个人求助行为。

“众筹平台应肩负起善款监管的责任,如何使善款公示常态化将是重中之重。”于亮说,平台在不断完善举报机制,建立社会人士“举报”机制,下一步还将考虑与相关机构合作进行对善款的监督。

此外,专家也建议,相关部门应提高平台的准入门槛。刘佑平说,募捐平台与慈善组织未来可以考虑共同开发高效便捷的募捐服务产品,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让公众的需求和体验得到最大化的满足。